

萨特，法国存在主义大师，二十世纪人类的良心，与他的终身伴侣、著名作家西蒙·波娃一起，于一九五年来华访问，参加国庆大典，广泛结交各界朋友，足迹遍至中国城乡，并在《人民日报》上发表重要文章。回国之后，萨特曾几次接受记者采访，充分表达了他的中国观；波娃则专门出版了《长征》一书，肯定新中国的成就，记录中国之行，探讨中国文化，并用大量事实纠正西方人的中国观。本书收录了萨特的两篇文章和采访录，并首次节译了《长征》的重要章节，并收入了有关萨特哲学的一些重要评论，充分展现了萨特和波娃的中国观以及中国对萨特和波娃的认识过程。

萨特和波娃 谈中国

SATE HE BOWA TAN ZHONGGUO

沈益洪 编

浙江文艺出版社



世纪回声
SHIJIHUI SHENG

萨特和波娃 谈中国

SATE HE BOWA TAN ZHONGGUO

沈益洪 编

浙江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严麟书

封面设计:池 晨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萨特和波娃谈中国/(美)萨特等著,秦悦等译.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1.1

(世纪回声书系/沈益洪编)

ISBN 7-5339-1363-9

I. 萨... II. ①萨...②秦... III. 访华观感
IV. D609.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29958 号

· 世纪回声 ·

萨特和波娃谈中国

沈益洪 编

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杭州飞达工艺美术印刷厂印刷
(杭州体育场路 347 号)

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8.25 插页 2 字数 190000 印数 0001—5000
2001 年 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39-1363-9/I·1217 定价:13.00 元

出版献辞

20 世纪的帷幕正在徐徐落下,新世纪的曙光已经照临了人类的窗口。

20 世纪的中国接受过不少新思潮、新观念,这些新思潮、新观念曾经极大地影响和改变了 20 世纪的中国。

从五四时代起,有一批大师不远万里,亲临中国,通过讲演、谈话和著述,带来新学说,传播新思想,足迹遍及大江南北,让我们有幸目睹他们的风采,倾听他们的指点。

他们是大师,是 20 世纪的文化名人,他们更是朋友。他们都抱有中国关怀、中国情结。在我们彷徨不定的时候,他们为我们授课讲学;在我们遭受异族欺凌的时候,他们为我们呐喊奔走;在我们取得成绩的时候,他们为我们欣喜鼓掌;他们的到来,本身就是一种热潮、一种力量。他们坚定的目光、自信的话语、超人的学识,曾经感动过我们的伟人:孙中山、毛泽东、周恩来、宋庆龄、鲁迅……也曾激动过我们一代又一代的热血青年,不少青年后来也成为了大师。

他们的学说盛行一时,影响深远,曾经引起过轰动,也引发过争论和思考……

是的,他们与 20 世纪的中国密不可分。或许他们的指点并不十分准确,但历史会记住他们的真诚。

此刻,我们正步伐坚定地迈向 21 世纪。我们不妨把回眸的

目光暂时集中在几位具有代表性的大师身上,他们的名字是:内山完造、杜威、罗素、泰戈尔、萧伯纳、萨特与西蒙·波娃。

我们收录他们的讲演和谈话,记录他们在华活动的行迹,选录当时及之后的种种评论。我们没有对这段历史中的是非曲直作出评说,只是试图较为客观、真实地复原这段历史。我们相信,有兴趣于此的读者,自会从这臧否声中,感受到时代风云的拨弄,思想文化观念的撞击,以及与当下生活的或隐或显的联系,从而有所感悟,有所心动。我们愿以此来纪念这些大师,纪念我们共同经历的这段风风雨雨,纪念将要逝去的 20 世纪。

为此,我们盛情推出“世纪回声”书系。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00 年 10 月

萨特和波娃谈中国(代序)

法国著名作家、存在主义大师让-保罗·萨特和西蒙·波娃，对于中国学术界来说，是如雷贯耳、耳熟能详的名字。

萨特(Jean-Paul Sartre, 1905.6.21—1980.4.15)，生于巴黎，早年丧父，寄居在外祖父家。外祖父是一位杰出的语言学家、法语教师，因此，萨特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打下扎实的文字功底。1924年，萨特进入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攻读哲学。1929年，他以第一名的成绩通过大中学教师学衔会考，并经短期服役后，在外省担任哲学教师。1933年，到柏林的法兰西学院学习，接受了存在主义理论，并形成自己的存在主义思想体系。“二战”爆发后，曾再次入伍。1941年再度任教。1945年，他创办《现代》杂志，成为职业作家。1964年，由于他的作品“思想丰富，充满自由气息和探求真理的精神”，瑞典文学院决定授予他诺贝尔文学奖，但萨特拒绝领奖，因为他“拒绝一切来自官方的荣誉”。

萨特始终关注人类和平事业，对“二战”时德国法西斯的侵略、“二战”后美国的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表示谴责，并在60年代反对法国殖民者对阿尔及利亚的战争。70年代，他曾积极支持法国左派的《人民事业报》，并以古稀之年，上街叫卖这张报纸。他因而被誉为“20世纪人类的良心”。

1980年，萨特在巴黎去世。几万名巴黎市民上街为他送葬。由于他“拒绝一切来自官方的荣誉”，法国总统德斯坦以个

人身份亲自前往向他的遗体告别。他的去世,使全世界主持正义、爱好和平的人们感到悲痛。

法国女作家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 1908—1986),她的名字总是紧跟在萨特之后。她生于巴黎,父亲是一位学识渊博、喜爱文学的律师。西蒙·波娃从小受基督教文学熏陶,6岁进教会学校,但后来成为无神论者。1929年与萨特在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相识相知,后来成为终身伴侣。同年,她以第二名的成绩通过学衔会考并取得哲学教师资格,可谓与萨特比翼齐飞。1931年起,在巴黎和外省讲授哲学课程。1954年,她的作品《大人先生们》获龚古尔文学奖。曾与萨特一起创办《现代》杂志,关注人类进步事业,做了许多工作。

萨特和波娃对中国十分友好。1955年9月至11月,他们曾来中国访问45天,并作为周恩来总理的客人,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国庆庆典。

1955年11月2日,萨特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我对新中国的观感》,充分肯定了新中国的建设成就,认为“这个伟大的国家正不断地在转变”,认为社会主义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为了建立一种更人道和更公正的社会制度而努力”,而法国人民对这个“伟大国家”,“只能抱有一种情感,那就是:友谊”。

回国后,萨特在《法兰西观察家》周刊1955年12月1日和5日这两期上,发表了《我们所见到的中国》一文,并表示将专门著书,讨论中国问题,可惜后来未能如愿。同时,他接受《新政治家与民族》杂志记者加罗尔的采访,于1955年12月3日发表了访谈录《对新中国的看法》。

西蒙·波娃回国后,于1957年专门出版了对新中国的观感《长征》一书,后来又在自传性作品《环境的力量》(1963)中提到访华之事。《长征》一书,后经人译成英文,厚达513页。该书除

介绍其访华观感之外,特别难能可贵的是,还详细介绍了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另有专门一章介绍中国各大城市:北京、南京、上海、杭州和广州。书中所谈中国之行不仅仅是观感,还充分反映了波娃的中国观,有不少精辟的见解;同时,以充足的事实驳斥了西方的反华观点,纠正了西方人对中国的看法。该书出版之后,曾在西方引起了巨大反响。尽管访华只有短短的45天,但波娃对中国的了解却是十分全面、十分详细。对此,我们不得不表示惊奇和佩服!

萨特和西蒙·波娃对中国一直十分友好,直到1975年,萨特还在其《七十岁自画像》的长篇谈话中谈到中国。当记者问他:“在你的同时代人中,你有没有对别的人也予以完全的器重?”他的回答是:

毛。我给与毛以完全的器重,至少一直到前几年。我不太理解“文化革命”,并非我反对它,一点也不,而是因为我不清楚这意味着什么,我想这在事实上也是不清楚的。

我在余年还愿意去几个地方旅行,其中有中国。我在它的历史的一个瞬间,在1955年,见过这个国家。后来发生了“文化革命”。我很乐意现在重新见到它,我想这样我就能更好地理解它。

萨特和波娃的学说在中国的传播,却是颇费周折。

早在1948年,著名学者罗大冈就曾撰文介绍过萨特的存在主义作品。后来,罗大冈于1955年接待过萨特和波娃。不过,萨特和波娃访华时,他们的存在主义的哲学和文学并不广泛为人知晓。那时,中国的学术界几乎无人知晓存在主义为何物。为此,萨特和波娃不免有些失望。萨特的存在主义广泛引起中国学术界的注意,却是在萨特去世之后。

先是中央电视台报道了萨特去世的消息。之后,张英伦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萨特——进步人类的朋友》一文;柳鸣九在《读书》杂志 1980 年第 7 期上发表了《给萨特以历史地位》;1981 年 10 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柳鸣九编选的《萨特研究》一书,详细介绍了萨特其人其哲学其文学。后来,萨特的《存在与虚无》《萨特剧作选》等先后有了中译本。1986 年 12 月,西蒙·波娃的《第二性——女人》一书的中译本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引起广泛注意。这样,存在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在中国广泛传播开来,不少人甚至接受了存在主义的世界观。

于是,在 80 年代中期,有了一场关于存在主义的讨论和论争。

正如“二战”之后存在主义在西方广泛传播有当时的社会心理一样,存在主义的一些观点迎合了刚刚从十年浩劫走出来的中国人的心理。然而,尽管萨特的哲学在很多方面与马克思主义有一致的地方,他本人也曾是“共产党的同路人”,但存在主义毕竟不同于马克思主义。因此,这场论争便以此为焦点而展开。

我们编译的《萨特和波娃谈中国》一书,主要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萨特和波娃谈中国的文章,除了萨特的《我对新中国的观感》《对新中国的看法》和波娃的《中国印象》之外,主要节译了《长征》一书中的几个章节,分为“前言”“文化”“文学”“十月一日国庆节”和“结论”这几节。这是《长征》一书首次与中国读者见面。

第二部分是 80 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界对萨特和波娃的几篇评论文章。这些文章,反映了我们对萨特和波娃的认识过程,有助于我们全面地了解存在主义。

我们无意重新评价存在主义,我们只是愿以此来纪念萨特

和波娃的中国之行,纪念他们对中国人民的友谊,同时纪念我们一起走过的这段道路,并愿以此献给 21 世纪的中国人。

沈益洪

2000 年 2 月

于上海大学文学院康桥作坊

目 录

萨特和波娃谈中国(代序)	沈益洪(1)
--------------------	--------

萨特和波娃谈中国

我对新中国的观感	让-保罗·萨特(3)
萨特对新中国的看法	加罗尔(10)
长征	西蒙·波娃著 秦悦译(17)
一 前言	(17)
二 文化	(40)
三 文学	(70)
四 十月一日国庆节	(108)
五 结论	(123)
中国印象	西蒙·波娃(146)

评论:萨特和波娃离华后

萨特——进步人类的朋友	张英伦(153)
给萨特以历史地位	柳鸣九(156)
西蒙·波娃	金德全(166)
我们应当怎样正确评价存在主义哲学	刘放桐(170)
萨特存在主义剖析	王克千(183)

略评存在主义·····	张念丰 邹铁军(202)
从立坐标看存在主义·····	赵鑫珊(216)
评存在主义对人生情态的分析·····	武 斌(219)
存在先于本质·····	俞吾金(229)
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对存在主义的评论·····	区惟尧等(234)
萨特传(节选)·····	高宣扬(243)
世事沧桑话萨特·····	柳鸣九(246)

萨特和波娃谈中国

原书空白页

我对新中国的观感

让-保罗·萨特

这个伟大的国家正不断地在转变。当我到达这里的时候，我那些从中国回到法国后的朋友们所讲的情况已经不再完全正确。等过了一个星期，我再说的话，也不会是完全正确的了。我在沈阳住了不到一个星期，等我回到北京的时候，北京的面貌，在某些街道上和某些市区里已经变了样子：有一些房子已经完工，另外一些又在动工。像我这样一个人来到这样一个国家住了45天，而这个国家的历史是那么样的丰富，它当前的情况又是那么样富有活力，所以最好的办法只有不讲话。可是，我的中国朋友们却要我谈谈对于中国的感想。我认为他们想知道的是，哪一些事情引起了一个最不了解情况的旅客的注意。既然是这样的话，不了解情况倒变成了一种优点，而初步的印象也许会包含一些真理。我所看到的也就是大家都看得到的东西：中国已经显示了它的无所不包的容貌。至于一些特定的真理，那是下一步专家们的事情。

正如你们可以想像得到的，首先令人吃惊的是你们任务的巨大。在几年以前，照你们的说法，你们的国家还是一个“半封建和半殖民地”的国家。在好些地区，你们农民的生活还和一千年以前没有多大区别。你们现在决定用50年的时间，来追上一千年的历史，把你们的经济制度、社会结构，甚至语言文字，都彻底改变。关于这一事业的伟大性，人们在巴黎读了你们的书籍，

看了你们的报告,也还是可以想像得到的。可是要真正掌握这个伟大的尺度,那却非得要亲自来到你们这里,参观了东北的大工厂,在归途走过你们的农村,在同一天里面,看到了鞍山的高炉和附近土墙茅舍的乡村,农民们有的还在徒手耕作。每一天,每看一眼,必定要同时看到古老的中国和未来的中国,才能够懂得你们当前的情况正是这个了不起的和生动的矛盾所构成的。

这就是不管什么时候都可以使人得到的一种最肤浅和最仓促的观感。一开始,人们就看得你们事业的多种多样性:中国必定要能够自己制造飞机、载重汽车、拖拉机,但也必定要扫除文盲,同时作家也必定要改造自己然后改造他们的作品,以便适应新的公众的需要。但是,只要对你们的各种问题作了稍为深入一些的考虑,特别是,只要听到你们专家的谈话,人们就会发现,你们的一切任务都是互相联系着的,都是彼此契合着的,好像在每一件事情里面,任何后果都会反映到原因上来,使原因再起变化。不错,只有发展重工业才能使农民得到拖拉机来完成农业集体化。但是,反过来说,如果集体化运动不从今天起就在农村中大规模发展起来,那么中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就会遇到严重的困难。在完全另外一个领域内,你们想用音符来代替汉字,以便简化汉文的学习,并且在借用或制定新的技术名词时获得便利。这样一来,文字的改革就更可以为生产服务了。然而,反过来说,发音的统一是文字改革的先决条件,而发音的统一又大部分要依靠交通:如公路、铁路、车辆等,总而言之,工业生产又反过来变成文字改革的必要工具。这样的例子是举不胜举的。如果你们不耐心地帮助一个外国人来了解的话,那么,他看到了你们一切事业的错综关系,也许会弄得迷失路途,白白地转起圈子来。过了几天,一个外国人所感到惊讶的,将是你们的远见。他很快就会察觉到,你们的政府不但不把这种错综的关系

看作是额外的困难,而且还把它当作是达到目的的最可靠的方法。你们的综合精神和辩证精神总是全面地来处理问题。你们决不肯孤立地对待问题,你们总是把你们整个社会最不相同的现象结合起来看的。在听你们谈话的时候,人们终于会清楚地了解到,每一个特定部门的进步,怎样会促进其他一切部门的进步。

当我们来到北京的时候,请你们相信吧,我们这些欧洲人也曾读过许多有关新中国的书籍和文章。但是,这些作家都是你们的朋友,究竟应该采取些什么办法并不需要他们来决定,所以他们往往不由自主地有一种倾向,即强调你们前进的道路上那些像里程碑似的困难。他们担心地说:“不过,文字是在中国各个不同地区发生联系作用的呀。假如我们的中国朋友们把文字拉丁化起来,那么,中国的北部同南部、东部同西部的文化联系,就会受到破坏的呀。因此,我们来到贵国,心里面充满了这一类令人担心的问题,同时也沉重地带着许许多多问题,慢慢地向你们提出。我们察觉到,你们对于这些问题是没有不接触的,但是你们是从实行方面来考虑这些问题的,你们决不从这里找一些借口来推委。你们只在这里面看出,应该依着什么次序来解决问题。因此,我们想向你们提出的问题,就没有多大意义了。你们的解答就在组织工作和工作方式里面。既然统一发音是文字拉丁化的必要条件,那不要紧,你们就先把语言统一起来。

这看起来似乎很简单,人们也许会说,这不过是一个方法问题。但是,只要稍为想一想,人们就会察觉到,仅仅这一个初步任务就已经需要极大的努力。你们镇静地说:“大概需要 15 年。”你们使人不能不肃然起敬的,不仅是你们的远见,而且还有你们那种无限的耐性。不错,统一语言需要 15 年,然后才能够处理拉丁化问题。过了 15 年,有些主张文字改革最为激烈的人,也许已经看不见他们的意愿变成现实。没有关系,他们只要